

# 重大突发事件下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变化： 基于潜变量增长和交叉滞后模型<sup>\*</sup>

于孟可<sup>1</sup>, 焦丽颖<sup>1</sup>, 郭震<sup>1</sup>, 史慧玥<sup>1</sup>, 赵锦哲<sup>1</sup>, 许燕<sup>1</sup>, 任爱玲<sup>2</sup>

(1.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 张家口 075000)

**摘要:**对 1495 名被试的价值观与幸福感进行了三个时间点的追踪研究, 通过潜变量增长模型和交叉滞后回归模型, 考察重大突发事件下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发现: (1) T1 到 T3 民众的自我超越价值观显著下降, 保守和开放价值观显著上升; (2) T2 到 T3 民众的幸福感显著下降; (3) T2 自我超越价值观正向预测 T3 幸福感, T2 自我增强价值观负向预测 T3 幸福感; (4) T2 幸福感正向预测 T3 自我超越和保守价值观, 负向预测 T3 自我增强和开放价值观。该结果为今后重大突发事件下的价值观引导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重大突发事件; 价值观; 幸福感; 潜变量增长模型; 交叉滞后模型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2)02-0136-08

## 1 引言

突发性的重大社会事件不仅会重塑社会的公共秩序, 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会极大地冲击民众的心理健康状态。重大突发事件下, 人们的焦虑、抑郁情绪不断上升, 幸福感却持续下降 (Bojanowska et al., 2021; Huang & Zhao, 2020); 而积极正向的价值观则有助于个体在突发事件中缓解焦虑、维持意义 (史慧玥等, 2020; Wisman & Koole, 2003)。基于此, 本研究旨在探究重大突发事件下民众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 为今后重大突发事件下的应急管理和有效引导提供参考。

### 1.1 价值观的结构及变化

价值观 (Value) 对个体的情绪感受、行为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塑造与引导作用, 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话题 (e. g., Bardi & Schwartz, 2003; Rokeach, 1973)。Schwartz (1992) 将价值观定义为广泛的、超越了具体情境的动机性目标, 是个体的行为和判断事物的标准; 他提出了 10 种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基本价值观: 普遍性、善意、权力、成就、传统、遵从、安全、享乐主义、刺激和自我导向。这些价值观构成了圆形的动机连续体, 并划分为两个维度、四种高阶类型: 自我超越价值观

(Self-transcendence) 表达了关怀他人福祉的动机, 与之相对的是自我增强价值观 (Self-enhancement), 表达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和主导地位的动机; 开放价值观 (Openness to change) 表达了在变化中保持独立自我的动机, 与之相对的是保守价值观 (Conservation), 表达了抵抗变化和重视秩序的动机。

价值观可变性的相关理论认为, 重大生活事件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影响, 为了更好地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人们会调整自身的价值观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 (Bardi et al., 2009; Milfont et al., 2016)。例如, 不利的环境会增加个体对权威的敬畏和对安全的重视, 而有利的环境则会促使个体更加强调自我表达 (Inglehart & Baker, 2000)。以重大社会事件为背景的研究中也发现, 个体对风险和威胁的感知会降低享乐和自我导向等开放价值观, 以及普遍性等自我超越价值观, 同时会增加安全和传统等保守价值观, 以及权力等自我增强价值观, 此类价值观变化模式在全球金融危机 (Sorthieix et al., 2019)、世贸中心袭击事件 (Verkasalo et al., 2006) 和战争 (Daniel et al., 2013) 等重大社会事件中均得到验证。基于此, 在国内的重大突发事件中, 我们对民众价值观的变化历程作出如下假设。

<sup>\*</sup>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3167116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9ZDA36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1 批面上项目 (2022M710431)。

通讯作者: 许燕, E-mail: xuyan@bnu.edu.cn。

假设1:在重大突发事件下,民众的自我超越价值观和开放价值观呈下降趋势,自我增强价值观和保守价值观呈上升趋势。

## 1.2 幸福感的概念及变化

“幸福”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人类的毕生追求。心理学研究者对幸福感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观点。Kashdan 等(2008)将幸福感(Well-being)概念化为快乐论幸福感(Hedonic well-being)和实现论幸福感(Eudaimonia well-being)两个维度的复合体。快乐论幸福感的主要代表是主观幸福感理论,该理论认为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和情感成分,即生活满意度和日常生活中的积极与消极情绪(Diener,2000)。实现论幸福感代表个人潜力的实现和表达,即通过自我发现、感知生活意义、并投入大量努力来实现个体的真实本性的过程(Deci & Ryan,2008)。

个体的幸福感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波动。例如,以往研究发现,国家之间法制、不平等、收入等社会环境因素导致了社会幸福指数的巨大差异(Oishi et al.,2011),失业或婚姻等重要生活事件也会改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Anusic et al.,2014;Lucas et al.,2004)。突如其来的重大社会事件也会威胁人们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例如,在美国(Kachanoff et al.,2021)、日本(Ueda et al.,2020)、爱尔兰(Lades et al.,2020)等国家开展的多项研究表明,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导致人们的幸福感显著下降;国内的研究中也表明,疫情的爆发增加了焦虑,降低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Wang et al.,202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2:在重大突发事件下,民众的幸福感显著下降。

## 1.3 价值观与幸福感的相互作用

Sagiv 和 Schwartz(2000)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出发,定义了“健康”与“不健康”的价值观。他们认为,追求成长和自我关注的价值观(如自我超越和开放价值观)会通过自我实现、表达想法和感受来获得更高的幸福感,是积极的价值观;相反,重视社会期望和自我保护的价值观(如自我增强和保守价值观)会使个体过分聚焦于降低威胁和减少焦虑,从而损害幸福感,是消极的价值观。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开放和自我超越价值观与幸福感呈正相关,而保守和自我增强价值观与幸福感呈负相关(Bobowik et al.,2011;Sorthaix & Schwartz,2017)。另有研究者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出发,认为以关系、自主和能力等内在目标为

导向的价值观(类似于自我超越和开放价值观)与幸福感正相关,以物质、声誉和外表吸引力等外在目标为导向的价值观(类似于自我增强和保守价值观)与幸福感则有负相关(Kasser et al.,2004)。此外,新社会分析模型(The neo-socioanalytic model)认为,价值观和情感等特质是处于同一层次的要素(Kandler et al.,2014),价值观和幸福感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优先级,都可以随环境而改变,并对彼此产生影响。Fetvadjev 和 He(2019)的研究中验证了这一观点,价值观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双向的预测作用。与此同时,社会环境的变动影响着价值观与幸福感间的关系(Bojanowska et al.,2021),重大突发事件将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动与冲击,因此有必要探究价值观和幸福感在重大突发事件下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3:在重大突发事件下,自我超越和开放价值观正向预测下一时间点的幸福感,自我增强和保守价值观负向预测下一时间点的幸福感。

假设4:在重大突发事件下,幸福感正向预测下一时间点的自我超越和开放价值观,负向预测下一时间点的自我增强和保守价值观。

本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事件下进行了三次施测,分别在2020年2月(T1)、2020年3月(T2)和2020年7月(T3)。三次施测均测量了被试的价值观,受问卷长度限制,仅在T2和T3测量了被试的幸福感。通过潜变量增长模型和交叉滞后回归模型,对重大突发事件下价值观和幸福感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关系进行验证。

## 2 方法

### 2.1 被试

通过网络问卷平台见数(Credamo, <https://www.credamo.com>)进行了三次施测,被试在每次施测时都要填写知情同意,并在作答完毕后得到10元报酬。T1时获得有效被试1495人,T2时获得有效被试1187人(与T1相比流失20.60%),T3时获得有效被试973人(与T2相比流失18.03%)。对价值观与幸福感的整体缺失机制进行Little's MCAR检验,结果显示数据为随机缺失, $\chi^2 = 19.07, p = 0.64$ 。保留完整参与三次施测的被试共968人,其中男性547人,女性421人, $M_{age} = 28.35$ 岁, $SD_{age} = 6.78$ (两名被试的年龄数据缺失)。详细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1。

表1 人口统计学信息

人口学特征	<i>n</i>	%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	0.41%
中学/技校	112	11.57%
大专院校	214	22.11%
大学本科	578	59.71%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60	6.20%
月收入水平		
2000 元及以下	26	2.69%
2001 - 5000 元	139	14.36%
5001 - 10000 元	351	36.26%
10001 - 20000 元	301	31.09%
20001 - 30000 元	110	11.36%
30001 元及以上	41	4.24%
地区		
疫情严重地区	288	29.75%
其他地区	680	70.25%
	<i>M</i>	<i>SD</i>
社会阶层(1 - 10)	5.46	1.53

注:湖北省为疫情严重地区,其他地区为除湖北省以外的其他省市地区。

## 2.2 测量工具

### 2.2.1 价值观

采用肖像价值观问卷(The Portrait Values Questionnaire - 21, PVQ - 21)测量被试的价值观。PVQ - 21 由欧洲社会调查在 PVQ - 40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Davidov, 2008),高志华等(2016)对其进行了中文版修订。量表共包含 21 道题目,每个题目描述一个肖像,例如“创造性和新颖的想法对他来说很重要”,被试需要对自己与所描述肖像的相似性进行评价(1 = 一点都不像,6 = 非常像)。量表分为自我超越、自我增强、保守和开放四个价值观维度。由于个体在使用该量表时存在反应偏向,因此根据每个人的平均得分对题目进行中心化,以控制反应偏差(Lindeman & Verkasalo, 2005)。计算各价值观维度下题目的均值作为价值观的指标。在本研究中,自我超越价值观三次测量的 Cronbach  $\alpha$  分别为 0.75、0.77、0.79,自我增强价值观三次测量的 Cronbach  $\alpha$  分别为 0.56、0.62、0.61,保守价值观三次测量的 Cronbach  $\alpha$  分别为 0.62、0.64、0.66,开放价值观三次测量的 Cronbach  $\alpha$  分别为 0.63、0.67、0.69。由于每个高阶价值观代表了较为广泛的概念,因此相对较低的一致性系数是可接受的(Bardi et al., 2009; Sortheix & Schwartz, 2017)。

### 2.2.2 幸福感

采用两种测量尺度同时从快乐论和实现论衡量被试的幸福感水平。对快乐论幸福感的测量采用

Diener 等(1985)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该量表包含 5 道题目,被试需要对其生活整体情况进行评价,例如“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两次测量的 Cronbach  $\alpha$  分别为 0.88、0.89。对实现论幸福感的测量采用 Diener 等(2010)编制的心理繁荣量表(The Flourishing Scale),该量表包含 8 道题目,被试需要对其积极心理资源和意义感进行评价,例如“我过着有明确目标和有意义的生活”(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在本研究中两次测量的 Cronbach  $\alpha$  分别为 0.88、0.90。由于本研究不探讨两种幸福感之间的差异,而是探究价值观对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因此计算所有题目的均值作为幸福感的指标。在本研究中,幸福感两次测量的 Cronbach  $\alpha$  分别为 0.92、0.93。

### 2.3 数据分析策略

使用 SPSS 25.0 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并考察幸福感的变化。使用 Mplus 8.3 构建潜变量增长模型(Latent Growth Modeling, LGM)探讨重大突发事件下价值观的变化趋势,截距表示四种价值观的初始水平,斜率表示价值观的变化。最后,构建交叉滞后回归模型探讨四种价值观与幸福感跨时间的相互影响。考虑到四种价值观和幸福感呈一定程度的偏态分布,因此采用稳健的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Robust Estimator, MLR)对潜变量增长模型和交叉滞后回归模型进行模型估计(Bandalos, 2014)。模型拟合指数的评估标准为 CFI > 0.90, TLI > 0.90, RMSEA < 0.08, SRMR < 0.08(Hu & Bentler, 1999)。

## 3 结果

###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分别对三次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表明,三次测量中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 25.28%、26.38%、27.37%,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Podsakoff et al., 2003),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时间的四种价值观和幸福感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 2 所示。从 T1 到 T3,自我超越价值观呈下降趋势,保守和开放价值观呈上升趋势,自我增强价值观总体变化不大。总体来看,幸福感与自我超越和保守价值观呈正相关,与自我增强和开放价值观呈负相关。对 T2 和 T3 的幸福感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T2 到 T3 民众幸福感显著下降,  $t(967) = 3.45, p = 0.001, d = 0.22$ 。

表 2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i>M</i>	<i>SD</i>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自我超越 T1	0.28	0.34	1												
2 自我超越 T2	0.23	0.33	0.54***	1											
3 自我超越 T3	0.21	0.33	0.49***	0.58***	1										
4 自我增强 T1	-0.08	0.40	-0.48***	-0.34***	-0.30***	1									
5 自我增强 T2	-0.07	0.40	-0.30***	-0.51***	-0.35***	0.52***	1								
6 自我增强 T3	-0.08	0.37	-0.34***	-0.37***	-0.46***	0.46***	0.52***	1							
7 保守 T1	0.01	0.29	-0.05	0.05	0.00	-0.37***	-0.14***	-0.11**	1						
8 保守 T2	0.04	0.28	0.04	-0.06	0.03	-0.18***	-0.31***	-0.12***	0.45***	1					
9 保守 T3	0.04	0.28	0.08*	0.03	-0.09**	-0.15***	-0.14***	-0.34***	0.41***	0.47***	1				
10 开放 T1	-0.19	0.31	-0.44***	-0.24***	-0.19***	-0.08**	-0.04	0.01	-0.57***	-0.31***	-0.33***	1			
11 开放 T2	-0.18	0.31	-0.25***	-0.39***	-0.24***	0.02	-0.13***	-0.02	-0.34***	-0.59***	-0.33***	0.53***	1		
12 开放 T3	-0.16	0.30	-0.24***	-0.25***	-0.44***	0.04	0.02	-0.08**	-0.30***	-0.37***	-0.57***	0.46***	0.54***	1	
13 幸福感 T2	3.80	0.64	0.07*	0.15***	0.17***	-0.09**	-0.14***	-0.18***	0.10**	0.05	0.12***	-0.08**	-0.05	-0.12***	1
14 幸福感 T3	3.74	0.68	0.07*	0.16***	0.16***	-0.11***	-0.13***	-0.18***	0.10**	0.05	0.10**	-0.06	-0.07*	-0.10**	0.73***

注:\*\*\**p*<0.001,\*\**p*<0.01,\**p*<0.05。

3.3  价值观的变化趋势

对四种价值观分别构建线性潜变量增长模型检验重大突发事件下民众价值观的变化趋势。将三次施测时间分别固定为第 0 月、第 1 月、第 5 月。结果表明,模型对数据拟合良好(见表 3)。价值观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自我超越价值观的初始水平为 0.26(*SE* = 0.01, *p* < 0.001),三次测量期间呈显著下降趋势,变化速率为 -0.01(*SE* = 0.002, *p* < 0.001),初始水平和变化速率之间无显著相关。自我增强价值观的初始水平为 -0.08(*SE* = 0.01, *p* <

0.001),三次测量期间无显著变化。保守价值观的初始水平为 0.02(*SE* = 0.01, *p* = 0.01),三次测量期间呈显著上升趋势,变化速率为 0.01(*SE* = 0.002, *p* = 0.01),初始水平和变化速率之间无显著相关。开放价值观的初始水平为 -0.19(*SE* = 0.01, *p* < 0.001),三次测量期间呈显著上升趋势,变化速率为 0.01(*SE* = 0.002, *p* = 0.01),初始水平和变化速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002, *p* = 0.02),即初始水平越高上升越慢。当前结果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 1。

表 3  潜变量增长模型拟合指标

潜变量增长模型	$\chi^2/df$	<i>p</i>	CFI	TLI	RMSEA	SRMR
自我超越价值观	18.22	0.00	0.97	0.92	0.13	0.03
自我增强价值观	0.61	0.44	1.00	1.00	0.00	0.01
保守价值观	3.41	0.07	0.99	0.98	0.05	0.02
开放价值观	1.50	0.22	1.00	1.00	0.02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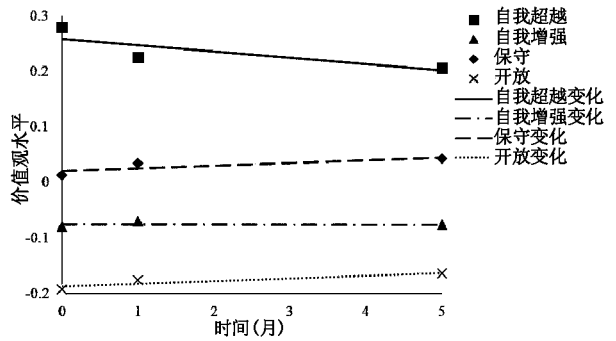


图 1  重大突发事件下的价值观变化趋势

3.4  价值观与幸福感的相互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究价值观与幸福感随时间推移的相互作用关系,对 T2 和 T3 的四种价值观与幸福感进行了交叉滞后回归分析。由于被试的性别、年龄、

所处地区(疫情是否严重)、受教育程度、社会阶层和月收入水平均可能影响被试的幸福感,因此对上述变量进行了控制。分析结果发现,四种价值观与幸福感的交叉滞后回归模型对数据拟合良好(见表 4、图 2)。具体来说,T2 自我超越价值观显著正向预测 T3 幸福感( $\beta = 0.06, SE = 0.02, p = 0.009$ ),T2 自我增强价值观显著负向预测 T3 幸福感( $\beta = -0.05, SE = 0.02, p = 0.039$ ),而 T2 保守和开放价值观对 T3 幸福感无显著预测作用,部分验证了假设 3。另外,T2 幸福感显著正向预测 T3 自我超越价值观( $\beta = 0.09, SE = 0.03, p = 0.001$ )和保守价值观( $\beta = 0.09, SE = 0.03, p = 0.001$ ),显著负向预测 T3 自我增强价值观( $\beta = -0.11, SE = 0.03, p < 0.001$ )和开放价值观( $\beta = -0.09, SE = 0.03, p = 0.001$ ),部

分验证了假设 4。

表 4 交叉滞后回归模型拟合指标

交叉滞后回归模型	$\chi^2/df$	$p$	CFI	TLI	RMSEA	SRMR
自我超越价值观与幸福感	1.42	0.20	1.00	0.99	0.02	0.01
自我增强价值观与幸福感	1.08	0.37	1.00	1.00	0.01	0.01
保守价值观与幸福感	2.42	0.02	0.99	0.97	0.04	0.01
开放价值观与幸福感	4.33	0.00	0.98	0.95	0.06	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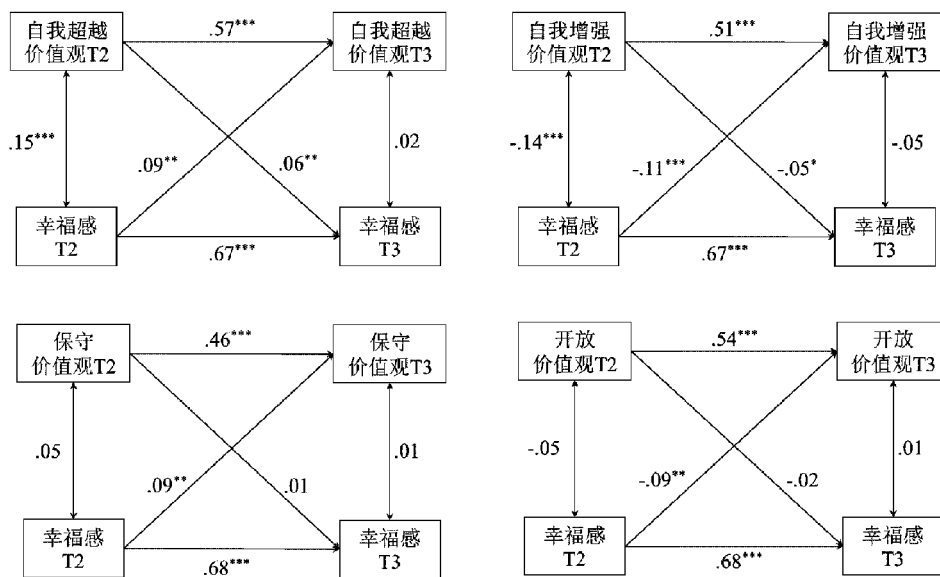


图 2 交叉滞后回归模型图

注: \*\*\* $p < 0.001$ , \*\* $p < 0.01$ , \* $p < 0.05$ 。

#### 4 讨论

本研究探究了重大突发事件下四种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变化,以及价值观与幸福感的相互影响。研究表明,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的自我超越价值观显著下降,保守和开放价值观显著上升,幸福感显著下降。同时,自我超越价值观正向预测幸福感,自我增强价值观负向预测幸福感,幸福感正向预测自我超越和保守价值观,负向预测自我增强和开放价值观。本研究揭示了重大突发事件中我国民众的价值观变化趋势,识别了突发性社会事件下积极与消极的价值观,对中国文化背景下价值观与幸福感的研究进行了补充,也为今后类似事件中引导民众价值观提供了实证支持。

##### 4.1 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

本研究结果发现,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的自我超越价值观显著下降,保守价值观显著上升,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中一致(Daniel et al., 2013; Sorthaix et al., 2019)。自我超越价值观是他人和社会导向的价值观(Schwartz & Sorthaix, 2018),其下降意味着民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会减少对他人的关注。保守价值观的上升则表明,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使民众更加渴望掌控变化并保证

安全。而与研究假设不同的是,开放价值观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显著上升,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在 2020 年 2 月~7 月这一施测时间段内,国内的整体疫情状况得到了逐步控制与缓解,人们能够逐渐地投入自我兴趣和能力的发展,来积极应对和处理社会事件给生活带来的改变。但结果同时表明,开放价值观的重要性处在最低的位置,说明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的开放价值动机仍是较为微弱的。总的来说,重大突发事件使民众的群体价值观向着更弱的自我超越价值观、更强的保守价值观转变。然而,以往研究表明,自我超越价值观与亲社会倾向和助人行为有正向的相关关系(Daniel et al., 2015; Heilman & Kusev, 2020),能够有效引导全社会团结协作,更好地应对社会危机事件。因此,在今后的重大突发事件下,应当着重加强对民众自我超越价值观的促进和引导。

另外,本研究结果表明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的幸福感显著下降,这与以往类似研究的结果相一致。虽然在 T3 时间点(2020 年 7 月)我国疫情状况已得到了初步控制,但疫情时代仍未完全结束,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仍然受到疫情的持续影响,因此,民众的幸福感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并未随着

疫情的缓解而有所恢复。这表明重大突发事件对民众幸福感具有持续性的影响效应。因此,在重大突发事件下,需对民众的幸福感及心理健康水平给予持续关注,以更好地促进民众幸福感的恢复与提升。

在价值观和幸福感的相互作用方面,本研究结果发现,重大突发事件下自我超越价值观与幸福感有积极的相互预测作用,自我增强价值观与幸福感有消极的相互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自我超越的价值取向能够带来健康的、积极的效应,而自我增强价值取向则可能带来不健康的、消极的效应(Bobowik et al., 2011; Sortheix & Schwartz, 2017)。因此,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府和媒体应当注重引导民众增强自我超越价值观,以促进民众良好地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威胁,保持身心健康和积极的生活状态。其次,本研究中开放-保守价值观维度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这与以往研究中不甚相同。以往研究中认为,开放价值观能够满足自主的内在需求,培养积极外向的情感表达方式,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Sortheix & Schwartz, 2017)。造成不一致结果的原因可能有:(1)从文化背景出发,以往研究大多在高度强调自我导向和享乐主义的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中开展(Zhang et al., 2014),开放-保守价值观在个体主义文化中是预测幸福感的关键维度;而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更加重视社会关系导向的个人价值(Uchida & Kitayama, 2009),因此自我超越-自我增强价值观维度才是中国文化中获得持久幸福感的关键所在(刘萍等, 2022);(2)从我国的疫情现状出发,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民众被居家隔离无法外出,原有的工作学习计划也因疫情被打乱(苏斌原等, 2020),在这种不可控制和预测的情境下,个体的自主需求无法在生活中得到实际的满足,可能也抑制了开放价值观的积极作用。另外,研究结果还发现,幸福感能够正向预测保守价值观,负向预测开放价值观。这一结果可能来源于重大突发事件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重大突发事件给社会环境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高幸福感的个体在此情境下可能更不愿其现有的生活遭到破坏,也不愿在风险变化中继续开放探索,从而更加重视安全与秩序,以保守价值观来抵抗社会变化和潜在风险带来的影响。

#### 4.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有待未来研究加以完善。首先,本研究中价值观仅在三个时间点测量,幸福感仅在两个时间点测量,故未能建立曲线模型更精确地探讨价值观和幸福感的变化模式,未来研究可以对更多时间点进行数据采集,建立更完备的数

据分析模型探究价值观和幸福感的长期变化趋势。第二,本研究仅探讨了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关系,而未探讨其相互影响的内在机制。例如,有研究认为价值观通过指导个体从事与内化价值观相一致的行为来促进幸福感的提升(Bojanowska & Kaczmarek, 2022),也有研究认为仅有特定的价值观可以通过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来提升幸福感(Sortheix & Schwartz, 2017)。未来研究可以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更细致的探究。最后,本研究仅探讨了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变化,而在重大突发事件后,人们的价值观是否会产生长期和持续的变化,价值观的变迁对幸福感和社会秩序等方面会带来何种深远影响,是未来研究可以继续发现与探索的问题。

#### 5 结论

(1)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的幸福感显著下降,自我超越价值观显著下降,保守和开放价值观显著上升;

(2)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民众的自我超越价值观正向预测幸福感,自我增强价值观负向预测幸福感;幸福感正向预测自我超越和保守价值观,负向预测自我增强和开放价值观。

#### 参考文献

- 高志华, 杨绍清, Juergen Margraf, Xiaochi Zhang, 路平. (2016). 施瓦茨价值观问卷(PVQ-21)中文版在大学生中的修订.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4(11), 1684-1688.
- 刘萍, 张荣伟, 李丹. (2022). 自我超越价值观对持久幸福感的作用及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30(3), 660-669.
- 苏斌原, 叶苑秀, 张卫, 林玛. (2020). 新冠肺炎疫情不同时间进程下民众的心理应激反应特征.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79-94.
- 史慧玥, 焦丽颖, 高树青, 于孟可, 许燕, 蒋奖, 王芳. (2020).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价值观特征及变化趋势探究. *心理学探新*, 40(2), 105-110.
- Anusic, I., Yap, S. C. Y., & Lucas, R. E. (2014). Does personality moderate reaction and adaptation to major life events? Analysis of life satisfaction and affect in an Australian national sampl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51, 69-77.
- Bandalos, D. L. (2014). Relative performance of categorical diagonally weighted least squares and 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21(1), 102-116.
- Bardi, A., Lee, J. A., Hofmann-Towfigh, N., & Soutar, G. (2009). The structure of intraindividual value 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7(5), 913-929.
- Bardi, A., & Schwartz, S. H. (2003). Values and behavior: Strength and structure of rel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

- chology Bulletin*, 29(10), 1207 – 1220.
- Bobowik, M., Basabe, N., Pérez, D., Jiménez, A., & Bilbao, M. Á. (2011). Personal values and well – being among Europeans, Spanish natives and immigrants to Spain: Does the culture matter?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2(3), 401 – 419.
- Bojanowska, A., & Kaczmarek, L. (2022). How healthy and unhealthy values predict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 – being: Dissecting value – related beliefs and behaviour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3(1), 211 – 231.
- Bojanowska, A., Kaczmarek, L. D., Koscielniak, M., & Urbańska, B. (2021). Changes in values and well – being amidst the COVID – 19 pandemic in Poland. *PloS One*, 16(9), 1 – 15.
- Daniel, E., Bilgin, A. S., Brezina, I., Strohmeier, C. E., & Vainre, M. (2015). Values and helping behavior: A study in four cult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3), 186 – 192.
- Daniel, E., Fortuna, K., Thrun, S. K., Cioban, S., & Knafo, A. (2013). Brief report: Early adolescents' value development at war time.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6(4), 651 – 655.
- Davidov, E. (2008). A cross – country and cross – time comparison of the human values measurements with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2(1), 33 – 46.
- Deci, E. L., & Ryan, R. M. (2008). Hedonia, eudaimonia, and well – being: An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1), 1 – 11.
- Diener, E. (2000). Subjective well – 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34 – 43.
- 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49(1), 71 – 75.
- Diener, E., Wirtz, D., Tov, W., Kim – Prieto, C., Choi, D. W., Oishi, S., & Biswas – Diener, R. (2010). New well – being measures: Short scales to assess flourishing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ling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7(2), 143 – 156.
- Fetvadjev, V. H., & He, J. (2019). The longitudinal links of personality traits, values, and well – being and self – esteem: A five – wave study of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7(2), 448 – 464.
- Heilman, R. M., & Kusev, P. (2020). Personal values associated with prosocial decisions. *Behavioral Sciences*, 10(4), 1 – 9.
- Hu, L. T.,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6(1), 1 – 55.
- Huang, Y., & Zhao, N. (2020).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leep quality during COVID – 19 outbreak in China: A web – based cross – sectional survey. *Psychiatry Research*, 288, 112954.
- Inglehart, R., & Baker, W. E.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1), 19 – 51.
- Kachanoff, F. J., Bigman, Y. E., Kapsaskis, K., & Gray, K. (2021). Measuring realistic and symbolic threats of COVID – 19 and their unique impacts on well – being and adherence to public health behavior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2(5), 603 – 616.
- Kandler, C., Zimmermann, J., & McAdams, D. P. (2014). Core and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description and theory of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and develop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8(3), 231 – 243.
- Kashdan, T. B., Biswas – Diener, R., & King, L. A. (2008). Reconsidering happiness: The costs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hedonics and eudaimonia.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3(4), 219 – 233.
- Kasser, T., Ryan, R. M., Couchman, C. E., & Sheldon, K. M. (2004). Materialistic values: Thei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T. Kasser & A. D. Kanner (Eds.), *Psychology and consumer culture: The struggle for a good life in a materialistic world* (pp. 11 – 28).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Lades, L. K., Laffan, K., Daly, M., & Delaney, L. (2020). Daily emotional well – being during the COVID – 19 pandemic.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5(4), 902 – 911.
- Lindeman, M., & Verkasalo, M. (2005). Measuring values with the short Schwartz's value surve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85(2), 170 – 178.
- Lucas, R. E., Clark, A. E., Georgellis, Y., & Diener, E. (2004). Unemployment alters the set point for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1), 8 – 13.
- Milfont, T. L., Milojev, P., & Sibley, C. G. (2016). Values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adulthood: A 3 – year longitudinal study of rank – order stability and mean – level differenc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2(5), 572 – 588.
- Oishi, S., Kesebir, S., & Diener, E. (2011). Income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2(9), 1095 – 1100.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 879 – 903.
- Rokeach, M. (1973).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Free Press.
- Sagiv, L., & Schwartz, S. H. (2000). Value priorities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Direct relations and congruity effec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2), 177 – 198.
- Schwart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5, pp. 1 – 65). Academic Press.
- Schwartz, S. H., & Sortheix, F. M. (2018). *Values and subjective*

- well-being*( pp. 1 – 16). *Handbook of Well – Being*.
- Sortheix, F. M. , Parker, P. D. , Lechner, C. M. , & Schwartz, S. H. (2019). Changes in young Europeans' values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0(1) , 15 – 25.
- Sortheix, F. M. , & Schwartz, S. H. (2017). Values that underlie and undermine well – being: Variability across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1(2) , 187 – 201.
- Uchida, Y. , & Kitayama, S. (2009). Happiness and unhappiness in east and west: Themes and variations. *Emotion*, 9(4) , 441 – 456.
- Ueda, M. , Stickley, A. , Sueki, H. , & Matsubayashi, T. (2020).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Japan during the COVID – 19 pandemic.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74(9) , 505 – 506.
- Verkasalo, M. , Goodwin, R. , & Bezmenova, I. (2006). Values following a major terrorist incident: Finnish adolescent and student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2001.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6(1) , 144 – 160.
- Wang, Z. , Luo, S. , Xu, J. , Wang, Y. , Yun, H. , Zhao, Z. , . . . Wang, Y. (2021). Well – being reduces COVID – 19 anxiety: A three – wave longitudinal study in Chin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2(8) , 3593 – 3610.
- Wisman, A. , & Koole, S. L. (2003). Hiding in the crowd: Can mortality salience promote affiliation with others who oppose one's worldview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3) , 511 – 526.
- Zhang, K. C. , Hui, C. H. , Lam, J. , Lau, E. Y. Y. , Cheung, S. F. , & Mok, D. S. Y. (2014). Personal spiritual values and quality of life: Evidence from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53(4) , 986 – 1002.

## Changes in Values and Well – being during Major Emergencies: Based on Latent Growth Model and Cross – lagged Model

Yu Mengke<sup>1</sup>, Jiao Liying<sup>1</sup>, Guo Zhen<sup>1</sup>, Shi Huiyue<sup>1</sup>, Zhao Jinzhe<sup>1</sup>, Xu Yan<sup>1</sup>, Ren Ailing<sup>2</sup>

(1.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 Faculty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No. 81 Group Army Hospital, Zhangjiakou 075000)

**Abstract:** A sample of 1,495 people was followed up for a 3 – wave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in values and well – being during a major emergency in China. Using latent growth models and cross – lagged models, the curr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changes in values and well – being during the major emergency, as well as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importance of self – transcendence values significantly declined from T1 to T3, while the importance of conservation and openness – to – change valu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2) people's well – being at T3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at T2; (3) self – transcendence values at T2 positively predicted well – being at T3, while self – enhancement values at T2 negatively predicted well – being at T3; (4) well – being at T2 positively predicted self – transcendence and conservation values at T3,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self – enhancement and openness – to – change values at T3. These results enlightene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self – transcendence values should be more emphasized in social guidance of values, so as to protect people's well – being from possible major emergenc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ajor emergencies; values; well – being; latent growth model; cross – lagged model